

## 西辽河文化的重要地位

2018年5月2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果揭晓:“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这一结论确立了西辽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西辽河文化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核心文化区并行发展,其史前畜牧实践、玉器制作、礼制祭祀等成果为中华文明核心要素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北方实证,将古国时代第一阶段向前延伸至距今58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一极。

历史上,东胡、鲜卑、乌桓、契丹、蒙古、女真等多个民族在此逐水草而居、繁衍生息,通过与中原民族及周边族群的长期互动交流,在文化习俗、生产方式、制度构建、身份认同等多个维度实现深度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汇聚、一体发展”的核心逻辑,为民族学研究“边疆民族融入中华文明”提供了完整的区域样本。特别是西辽河文化发轫阶段便蕴含的对中原文化的强烈向心力和多元交汇基因,使其成为各民族踏上中华融合之路的重要通道。“各民族平等相待、互鉴共生”的融合逻辑,为民族学提供了鲜活的实证。

西辽河流域连接东北、华北与蒙古高原的地缘区位,赋予其无可替代的“战略枢纽”属性。世代居住于此的各族人民,更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守边护疆”的屏障功能。辽代以上京临潢府为中心构建全域防御体系,依托河流天险修建驿路烽燧,织就边疆安防网络;金代设西北路、东北路招讨司,以军政一体模式拱卫中原腹地安全;明清时期,这里更被视为“京畿屏障”,卫所屯垦与盟旗制度相辅相成,筑牢坚不可摧的戍边防线;清代科尔沁部积极参与盟旗制度建设,守卫边疆、维护国家统一,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步入近现代,抗日战争时期,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组建蒙汉抗日义勇军、东北抗联等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内蒙古骑兵第二师为代表的铁血旅驰骋疆场,各族民众踊跃支前,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积极投身西辽河生态补水、科尔沁沙地治理、耐寒作物规模化种植等建设实践,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园、建设祖国。这些跨越时空的红色实践,既是西辽河文化基因的一脉相承,更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彰显,共同书写了中华红色文化篇章。

## 西辽河文化的多元价值

西辽河文化数千年无断层的文明发展脉络,成为连接草原文明、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核心纽带,其多元价值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的集中彰显。

西辽河文化绵延数载未断裂的连续性,为勾勒文明交融进程提供了清晰历史轴线,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据关键地位。从时间维度看,西辽河地区史前文化一脉相承,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序列。新石器时代的小奈林遗址8000多年前的房屋遗迹,标志着先民从“流动狩猎采集”向“固定定居生活”过渡,实现了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衔接;此后,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70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6400年)→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000—3500年)等文化类型相继发展,构成环环相扣、传承有序的文化链条。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在陶器制作中体现尤为鲜明,兴隆洼文化以平底罐、钵为主,采用压印纹饰,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新增碗、盂、尊等多种器型,纹饰在网格纹、之字纹基础上新增神秘几何纹与鸟兽纹,趋于繁富;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出现大量彩陶、灰陶和磨光黑陶。这种从简单工具到精美器物的工艺演进,与器物功能的不断拓展相呼应,充分印证了西辽河文化的一脉相承。

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体现了西辽河文化守正创新的实践价值。辽代工匠在唐三彩基础上创新出辽三彩,以黄、绿、白为主色,器形适配游牧生活需求,成为草原手工业的代表成果;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龙纹金带銙,契丹革带结合中原龙图腾,八块金銙的升龙、降龙与云水纹的锤揲技源自唐代,带銙的实用性则适配游牧骑射的着装需求;这些创新构建了农牧互补的物质文明体系。精神文明的突破筑牢了文化认同的精神根基。红山文化的龙崇拜创新延续至今,彩陶坡遗址出土的早期龙形蚌饰,早于各积石家玉龙,证实龙崇拜在红山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性,成为中华龙图腾的重要源头;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积石家构建起“家坛结合”的祭祀体系,写实风格的陶塑女神像突破史前雕塑艺术传统,推动礼制文明初步形成;哈民陶猪肚子中空,贮藏种子,成为祭祀有代表性的器物,体现了史前先民的工艺设计与原始信仰。政治文明的革新探索成就多元治理的中国方案。契丹建立的辽朝创新推行南北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西辽政权延续此制并兼容西域民族治理模式,实现多民族区域的有效治理,这种政治智慧被后世借鉴。

西辽河文化有着强烈的“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这即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在漫长进程中,通过文化符号共享、价值观念融合与政治秩序构建,不断强化区域内及跨区域文化认同与政治凝聚,为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深厚历史基础。从史前时期开始,西辽河流域形成的文化,逐渐突

破地域限制,成为北方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共享标识。辽、金等政权在西辽河地区大力推行中原文化制度,汉字、儒家经典、礼仪制度等核心文化要素被广泛接纳,辽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壁画,大量引用中原典籍与历史典故,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统一性。政治凝聚的实践探索,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制度根基,也印证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的深刻内涵。红山文化时期,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大型礼仪中心的出现,标志着西辽河流域已形成“古国”形态;到了辽代,契丹政权推行“因俗而治”的治国方略;金代则进一步推进汉化改革,下诏“更定德运为土”,将自身排进北宋之后的历史谱系,全面推广中原礼乐制度与农业生产方式。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政权统一,更强化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的共同信念。尤为重要的是,西辽河流域出土的秦代陶量残片,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证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秦法已抵达这片地域。

西辽河文化的包容性特质尤为突出。史前时期,小奈林遗址出土的绳纹陶器、扁洞室墓等文化因素,与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存在密切关联;而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器物,既保留了西辽河文化的本土特色,又融入了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元素,如彩陶纹饰中的弧线三角纹、鼎足造型等,充分体现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红山文化时期,更是主动吸纳中原文化精华,将仰韶文化平底陶器类型的玫瑰花纹图案与本地龙纹相结合,创造出“龙与花”的文化符号,成为史前文化融合创新的典范。历史向前发展,西辽河文化的包容性在多元融合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在建筑领域,库伦三大寺采用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经济领域,契丹先民不仅学习中原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还保留了本民族的游牧传统,同时吸纳了渔猎民族的生产经验。满蒙联姻、茶马互市等政策与贸易形式,进一步推动了汉族、契丹族、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与血缘交流,使西辽河文化成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宗教信仰层面,北方草原民族传统的萨满教在此广泛传播,随着中原文化传入,佛教、道教等宗教也得以落地发展,不同宗教信仰和谐共处、相互影响,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世界,更彰显了西辽河文化包容多元的内在品格。

西辽河流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其和平性升华于互鉴共赢的发展价值。西辽河文化的政权与民族始终坚守“保合太和”的追求,在促进对外交流及和平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考古实证来看,辽墓出土的玻璃器是西辽河文化对外和平交流的重要实证。通辽吐尔山辽墓与陈国公主辽墓中,均出土多件带有浓厚罗马—拜占庭帝国风格和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皿,这些玻璃器不仅印证了西方文化已经抵达西辽河流域,更为研究辽代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脉络、复原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图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在历史长河中,商队、使者、僧人等不同身份的群体穿梭于此,构建起常态化的交流网络。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经西辽河流域远销北欧,北欧的珠宝、玻璃器等特产也由此传入。与此同时,文化层面的交融同步推进,外来文化沿草原丝绸之路进入西辽河流域,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吸纳融合,催生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繁荣局面。这种以和平为底色的文化传播模式,既增进了不同地区间的认知与理解,又推动了不同文化体系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为维护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辽河(奈曼旗融媒体中心供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表明:在中华文明“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式向心结构”形成的早期阶段,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片土地孕育的西辽河文化,兼具历史深度、文化广度与战略高度,既是北方地区文化品牌建设的核心载体,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深入探究西辽河文化的重要地位与多元价值,对于厘清中华文明起源脉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破地域限制,成为北方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共享标识。辽、金等政权在西辽河地区大力推行中原文化制度,汉字、儒家经典、礼仪制度等核心文化要素被广泛接纳,辽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壁画,大量引用中原典籍与历史典故,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统一性。政治凝聚的实践探索,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制度根基,也印证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的深刻内涵。红山文化时期,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大型礼仪中心的出现,标志着西辽河流域已形成“古国”形态;到了辽代,契丹政权推行“因俗而治”的治国方略;金代则进一步推进汉化改革,下诏“更定德运为土”,将自身排进北宋之后的历史谱系,全面推广中原礼乐制度与农业生产方式。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政权统一,更强化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的共同信念。尤为重要的是,西辽河流域出土的秦代陶量残片,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证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秦法已抵达这片地域。

西辽河文化的包容性特质尤为突出。史前时期,小奈林遗址出土的绳纹陶器、扁洞室墓等文化因素,与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存在密切关联;而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器物,既保留了西辽河文化的本土特色,又融入了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元素,如彩陶纹饰中的弧线三角纹、鼎足造型等,充分体现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红山文化时期,更是主动吸纳中原文化精华,将仰韶文化平底陶器类型的玫瑰花纹图案与本地龙纹相结合,创造出“龙与花”的文化符号,成为史前文化融合创新的典范。历史向前发展,西辽河文化的包容性在多元融合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在建筑领域,库伦三大寺采用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经济领域,契丹先民不仅学习中原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还保留了本民族的游牧传统,同时吸纳了渔猎民族的生产经验。满蒙联姻、茶马互市等政策与贸易形式,进一步推动了汉族、契丹族、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与血缘交流,使西辽河文化成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宗教信仰层面,北方草原民族传统的萨满教在此广泛传播,随着中原文化传入,佛教、道教等宗教也得以落地发展,不同宗教信仰和谐共处、相互影响,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精神世界,更彰显了西辽河文化包容多元的内在品格。

西辽河流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其和平性升华于互鉴共赢的发展价值。西辽河文化的政权与民族始终坚守“保合太和”的追求,在促进对外交流及和平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考古实证来看,辽墓出土的玻璃器是西辽河文化对外和平交流的重要实证。通辽吐尔山辽墓与陈国公主辽墓中,均出土多件带有浓厚罗马—拜占庭帝国风格和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皿,这些玻璃器不仅印证了西方文化已经抵达西辽河流域,更为研究辽代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脉络、复原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图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在历史长河中,商队、使者、僧人等不同身份的群体穿梭于此,构建起常态化的交流网络。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经西辽河流域远销北欧,北欧的珠宝、玻璃器等特产也由此传入。与此同时,文化层面的交融同步推进,外来文化沿草原丝绸之路进入西辽河流域,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吸纳融合,催生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繁荣局面。这种以和平为底色的文化传播模式,既增进了不同地区间的认知与理解,又推动了不同文化体系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为维护文化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 以西辽河文化深厚底蕴促进辽河现代化建设

深入挖掘西辽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千年

文明根脉滋养发展动能,以优质服务供给赋能发展提质,既是践行国家生态安全、民族团结、向北开放三大战略的具体举措,更是促进辽河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可行之路。秉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的理念,我们应该深耕文明根脉研究,以其历史内涵与精神内核赋能民族交融、创新文化传播、发展文旅产业,成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文化新质生产力”。

在深耕文明根脉研究上,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理念,厘清历史脉络,深挖文化内涵,做好传承转化与价值赋能工作。一是深化研究体系,锚定现实价值与跨域协同。紧扣乡村振兴、文化繁荣、民族交往交流等时代命题,确立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组建涵盖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学等领域的复合型研究团队,充分释放跨学科研究优势;聚焦西辽河文化中通辽地区文化与牛河梁红山文化、西辽河文化及中华文化的内在关联,多维度深挖西辽河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二是激活活态传承,夯实田野根基与资源储备。以田野调查为抓手,系统记录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文化表征,全面梳理挖掘西辽河文化活态资源;建立规范化的文化传承数据库,推动文化基因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自然延续、代代相传。三是推动价值转化,健全协作机制与平台支撑。持续完善跨区域协作机制,深化“高校—地方—智库”协同研究模式,通过出版研究丛书、制作专题纪录片、开发数字文化产品等多元载体,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社会教育资源有效转化;打造集文物展示、学术研讨、实践教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让西辽河文化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被更多人知晓、认同与传承。四是加强遗址遗址的保护。一方面通过高分辨率摄影、三维扫描等数字化技术,全方位记录文化遗产细节并创建精确数字模型;另一方面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文物所处环境状态,确保遗产安全与可追溯。同时,为避免城乡建设对地下遗址造成不可逆破坏,更好守护文明根脉,前期还应开展“拉网式”全面调查,构建预防性保护机制。

以民族学视角加强对西辽河文化的阐释,既是通辽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民族团结根基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通辽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关键举措。一是深化民族交融理论阐释,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传播,让民族特性研究与文明格局阐释转化为民族团结实践的强大动力,充分彰显民族团结在实践中的蓬勃生命力。二是拓展全域交融实践场景,促进共建共享。在教育领域,编写西辽河民族交融特色校本教材,构建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民族团结教育平台,强化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依托特色种养、民族手工艺品加工、文旅融合等优势产业,促进各民族农牧民团结致富,让大家在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增进感情,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要不断创新文化传播路径,精准贴合受众需求,持续创新传播载体,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持久生命力,被更广泛群体看见、了解并认同。一是进一步细化受众圈层,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内容供给与传播体系。面向青少年群体,除持续推进主题研学线路外,可借鉴河南“唐宫夜宴”传统文化年轻化转译的成功经验,开发西辽河文化主题的动漫课程、互动数字小游戏,实现“教育+传播”的深度融合;针对年轻消费群体,联动抖音、B站等头部短视频平台开展活动,鼓励年轻群体主动参与文化传播;面向学术研究者,持续完善跨区域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发布考古成果数据集、专题研究文献汇编,搭建线上学术研讨专区,促进专业领域的深度对话。二是夯实数字传播阵地,拓展传播广度

与深度。搭建西辽河文化数字资源总库,存储考古发掘成果、文物高清影像、非遗技艺视频、民族交融故事文献等各类资源,实现资源集中管理、分类检索与开放共享,为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公众学习提供权威、便捷的素材支撑。优化“西辽河文化数字展厅”,引入VR/AR技术,让观众可“云端”沉浸式探秘哈民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等文化地标,近距离观赏文物细节;借助大数据分析用户偏好,精准推送个性化文化内容,提升传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三是创新文化传播展示形式,筑牢情感共鸣纽带。围绕各族群众共同抵御灾害、携手建设家园、互通有无发展贸易等真实历史场景与鲜活故事,倾力打造电视剧、纪录片、动漫等多元化文艺作品,推出一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民族题材精品力作,让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持续打造“悦来通辽”文旅品牌,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赋能成效。一是推进关联遗址联动,构建全域文旅发展格局。打破单点孤立格局,形成文化叙事闭环,提升文旅吸引力与承载力。积极推动河北、辽宁、内蒙古三省区《冀蒙辽西辽河文化发展工作联席机制》协议见效,在遗址保护、成果阐释、文旅发展等方面协同发力。在现有“西辽河流域史前遗址考古博物馆联盟”建设基础上,梳理蒙辽辽三地区遗址间的历史脉络关联,共同打造跨区域主题游览线路,统一文化标识、导览体系与联动打卡产品,并联动沿线乡镇打造特色民俗体验点与农产品展销点,实现“遗址游览、文化体验、乡村消费”的融合,推动文旅效益从单点集聚向跨区域全域辐射。二是激活青年活力,筑牢文旅融合内生动力。从传播赋能、创意赋能、人才赋能三方面激活青年活力。面向通辽本地高校、返乡青年及自媒体创作者,招募具备内容创作、活动策划能力的青年人才,引导他们以短视频、直播、图文创作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主流社交平台传播西辽河文化相关内容,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文旅传播账号;围绕文创产品设计、数字化体验场景开发、文旅节庆活动策划等方面征集作品,将优秀创意转化为实际文旅产品与业态;优化青年文旅创业扶持政策,针对青年参与民宿经营、非遗手作创新、文旅新媒体运营等业态,提供创业补贴、场地支持、媒体培训等保障,为西辽河文化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三是打造特色文旅IP,拓宽产业价值边界。借鉴相关经验打造差异化特色文化IP体系。首先,深化文化元素挖掘与解码,提炼西辽河相关历史文化印记、马文化、安代舞等非遗艺术中的核心元素,构建辨识度、内涵丰富的IP素材库,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文创商品。探索IP与潮流卡牌、数字藏品、短视频剧情、动漫绘本等载体的融合,再强化IP场景化落地,推动IP与节庆赛事、景区体验、乡村旅游等场景深度融合,在西辽河文化节、哲里木赛马大会中植入IP主题表演、互动装置,在核心遗址景区打造IP沉浸式体验区,在乡村旅游点设置IP主题民宿、文创商店,进一步释放“悦来通辽”品牌的经济价值与文化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地域文化活化与发展指明了科学路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辽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仍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立足西辽河与科尔沁的丰厚文化沃土,将“因地制宜”创造性运用于文化建设各领域,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激活文化内在动能。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西辽河文化,对历史要敬畏与传承,对未来更要负责与担当,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写下更加辉煌的篇章。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5M33;作者单位:通辽市图书馆)

# 西辽河文化的重要地位与多元价值

● 梁大光



●左一:哈民遗址中的房屋区域(中新社记者刘文华摄)  
●左二:南宝力皋吐遗址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罐  
●左三:吐尔山辽墓—彩棺(通辽市博物院供图)  
●左四:金界壕(网络)